

论日本文化传统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影响

曹能秀，王凌

(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2)

摘要: 日本文化传统主要为“和”的观念和集团主义。二者对日本学校道德教育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本文主要评述了“和”的观念和集团主义对二战以来日本学校道德教育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日本; 文化传统; 学校道德教育; 影响

中图分类号: G 40 - 0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390X (2007) 01 - 0088 - 05

Influence of Japanese Cultural Tradition on School Moral Education

CAO Neng-xiu, WANG Ling

(Facult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China)

Abstract: Japanese culture tradition mainly expressed in “He” idea, that means harmoniousness, and bloc doctrine. The two aspects have a positive as well 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its school moral education. This essay mainly makes a review on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n Japanese school moral education imposed by the “He” idea and bloc doctrine since World War II.

Key words: Japan; cultural tradition; school moral education; influence

文化传统, 又称民族文化传统或民族传统, “是指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对现实社会仍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特质或文化模式。”^[1]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日本文化传统很特别, 既和西方文化传统有质的差别, 又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有着明显区别。一般认为, “和”的观念和集团主义是日本文化的特质。事实上, “和”的观念和集团主义有着密切关系,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后者是前者的具体表现。为了论述方便, 在此主要侧重“和”的观念中所强调的人际关系和集团主义中的集团意识, 将二者分开阐述。总的来说, “和”的观念和集团主义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既有积极的影响, 也有消极的影响。本文主要就二者对二战以来日本学校道德教育的消极影响进行评述。

一、“和”的观念对学校道德教育的消极影响

重视人际关系是东方道德的一个重要特征。日本对人际关系的重视有其自身的特点, 即强调“和”的观念。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把日本人重视人际关系, 以宽容态度处理人际关系的做法提炼为“和”的思想。他认为, “和”的观念是贯穿于日本文化的原理, 是日本精神的核心和日本人价值观的基础。^[2]确实, “和”的观念已经渗透到日本的精神世界中, 并以各种物质和精神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 日本民族就称为“大和”民族。凡是日本本土固有的东西, 比如“和歌”(日本诗)、“和绘”(日本画)、“和琴”(日本琴)和“和服”等, 都以“和”冠之。“和”的观念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等级关系。在集团中, 为了使集团内部成员的关系和谐、统一, 集团中的

收稿日期: 2007-07-15

作者简介: 曹能秀 (1964-), 女, 福建顺昌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比较教育、道德教育和幼儿教育研究。

人必须严格遵守等级秩序。日本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在分析日本的社会构造、研究日本人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日本人重视较之‘横式’人际关系更重视‘纵式’人际关系。”^[3]这里所说的“纵式”的人际关系是以等级秩序为基础构成的，强调等级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我国学者吴潜涛指出，重视人际关系的观点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但进入日本以后，却失去了中国儒教原有的那种人本主义观点，人际关系中的双向性义务变成了下对上、卑对尊的单方面的绝对服从。^[4]总之，日本文化中“和”的观念是和等级秩序相联系的，等级秩序是维护人际关系的前提条件。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和”的观念还是构成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

总之，日本人的这种蕴含着等级关系的“和”的观念，和西方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等观念是相对的，但却没有因为西方文化的输入而被扬弃，而是被继承和发扬下来。“和”的影响不完全是负面的，但它强化了日本社会等级制的人际关系，甚至起到增强日本国民天皇制意识的作用，同时也阻碍了自由、平等和个性等西方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成为日本政治现代化发展的绊脚石。

（一）等级观念渗透到道德教育领域，并在学校道德教育中得到强化

二战以后，尽管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强调个人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但在道德教育领域中，仍然强调以“和”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在道德教育的内容上，虽然去除了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中下对上、卑对尊等绝对服从的人际关系，但仍然强调以“和”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强调作为家庭成员、社会成员和国民必须注重的人际关系和必须处理好与集体的关系。1951年天野提出的《国民实践要领》，罗列了日本人作为个人、家庭成员、社会及国家成员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在天野看来，无论是作为家庭成员，还是作为社会和国家中的个人，都应该遵守一定的人际关系。他有关敬爱天皇的观点明确提出了国民对天皇的服从关系，有回归《教育敕语》中下对上、卑对尊的绝对服从的人际关系之嫌，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无独有偶，15年以后的1966

年中教审发表的《理想的人》的咨询报告，再次提出了作为个人、家庭成员、社会成员和国民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其中，有关对国家、对国家的象征的天皇的下对上、卑对尊的关系，是《教育敕语》和《国民实践要领》的翻版，受到了舆论的猛烈批判。尽管《理想的人》未能获得法律效力。但是，它所表达的“爱公司”、“爱国家”的思想受到了保守人士欢迎，成为1968年课程改革的哲学背景，在1968年小学和初中的《学习指导要领》中得到了体现。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1977、1989和1998的三次课程改革中，在道德教育内容方面，仍然强调人际关系的教育。1977年的《学习指导要领》，受田中角荣“五个重要”、“十个反省”的德育论的影响，强调“尊重人”、“关心长者”、“同情弱者”、“尊重父母和老师的意见”等人际关系的培养。在反映1989年和1998年两次课程改革的《学习指导要领》中，都强调从四个方面的视点（“有关自己的内容”、“有关与他人关系的内容”、“有关与自然及崇高事物关系的内容”、“有关自己与集体以及社会关系的内容”）来进行道德教育。其中，“有关与他人关系的内容”和“有关自己与集体以及社会关系的内容”都是关于人际关系的伦理。1989年，文部省规定中小学必须升国旗、奏国歌。1999年夏，国会又通过“国旗国歌法案”，宣布了国旗和国歌的合法性。这样，日本中小学生每天通过升国旗（“日之丸旗”）、奏国歌（《君之代》歌）的方式，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国家和天皇的崇敬之感。

（二）“和”的观念对儿童不良行为和心灵危机的影响

作为日本文化传统之一的“和”的观念，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罩住了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是造成儿童的不良行为和心灵危机的原因之一。首先，“和”的观念是造成儿童的欺侮、暴力等不良行为的根源之一。“和”的观念强调在等级制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是造成儿童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之一，也是造成儿童在社会中不平等地位的原因之一。儿童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低年级儿童必须要服从高年级儿童，尊之为“学长”，受其压制，否则要遭受欺

侮或暴力；儿童必须服从班级中儿童的内部权威，否则也会遭受欺侮或暴力；在身体、智力等方面弱小的儿童处于儿童世界中的劣等地位，要受到其他儿童的欺侮或暴力；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侨民的后代则处于儿童世界的最底层，受到更严重的排斥、欺侮或暴力等等。除此之外，儿童在日本社会中也受到成人社会的压制和打击。例如，儿童必须要服从教师，否则就要受到教师包括体罚在内的惩罚；儿童要服从学校的管理体制，否则要受到校规等的惩罚；某些儿童还要服从专制型家长的权威，否则要遭受暴力等惩罚等等。总之，在儿童社会和成人社会多种权威的压制下，儿童的身心遭受摧残，无法体会到人的尊严和人生的乐趣。有的被欺侮，有的被施与暴力，有的不敢上学，有的中途退学，有的使用暴力手段报复他人或转向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或动物，有的染上了吸毒等不良行为习惯不能自拔，有的甚至被逼自杀等等。

其次，“和”的观念是造成儿童心灵危机的原因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和”的观念是造成儿童人际关系淡漠、内心孤独的根源之一。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人际关系，使得高年级与低年级、老师与学生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得跨阶层的儿童与儿童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往变得虚伪和不真实。在儿童社会中，低年级儿童对高年级儿童的服从带有不情愿的成分；儿童对班级中的内部权威的服从也常常是不得已而为之；侨民的后代受到不合理的对待而不得不忍辱负重等。在日本社会中，儿童和教师、学校的管理者以及父母缺乏平等的交流和沟通的权利，不得不服从教师的体罚、学校的管理和父母的意志。当儿童和同伴之间、和成人之间缺乏平等的关系时，儿童就无法敞开他们的内心，和人的交往也变成了虚伪的俗套，缺乏真诚的爱和关心，关系变得淡漠，心灵变得孤独和痛苦。二是“和”的观念强调学校、班级和儿童团体的正常运转，强调团体的凝聚力，容易使儿童丧失自我，丧失个人的自由，容易使儿童的个性淹没在团体之中。除少数团体中的领导者外，团体中的大部分儿童处于被压抑的地位，不得不压抑自我，表现出忍让和宽容，到了忍无可忍的时

候，就会爆发出来，引起欺侮、暴力和其他不良行为。

二、集团主义对学校道德教育的消极影响

很多学者认为，集团主义或整体意识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和一直强调集体主义教育的中国相比，日本的集团主义意识更强。这是因为，集团主义的传统不仅通过学校道德教育也通过家庭和社会的影响、通过文化的蓄积与沉淀渗入到大和民族的灵魂中，一直保持至今。集团主义意识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时日本政府大肆宣扬国家主义，并以此为愚弄日本国民的思想工具，侵略亚洲国家。二战以后，尽管已经不再提“国体”、“国家主义”等词，但集团主义仍然是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日本学校设有的“特别活动”，就是希望通过学校集团的特别活动，培养学生的集团主义精神，培养对集团的归属感和忠诚心。^[5]

（一）集团主义造成了学校道德教育的困境

日本学校道德教育内容中对集团意识的强调和对个人主义的忽视，造成了学校道德教育的困境：首先，道德教育无法阻止校外的信息空间对儿童进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熏染，也无法进行正确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教育。其次，从日本经济、教育发展的状况来看，提倡个性和个人价值是振兴日本经济、培养创新性人才的重要前提之一，只强调集团主义的道德教育却与其背道而驰。第三，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社会，培养拥有广阔的心胸、放眼世界、具有鲜明个性的下一代是十分重要的，在道德教育中过分强调集团意识和国家利益的有关内容容易使日本民族、日本人、日本和世界其他民族、其他人民、其他国家分隔开来，也和道德教育中有关“作为世界中的日本人”的内容相矛盾。诚如吉水·汗所指出的那样：“在战前，教育敕语、修身科和国体鼓励日本人民在危急时刻应为国家的利益而尽责；之后，侵略和扩张主义的野心导致了战争。今天，道德传递必要的价值，调整人们的心态以应对现存的危机、竞争的挑战以及在全球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对日本而言，它仍然是一个‘我们反抗世界’的等式。”^[6]

(二) 集团主义助长了儿童的欺侮和暴力行为

日本文化传统中的集团意识和学校道德教育对集团意识的强调、对个人主义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儿童的欺侮和暴力行为。首先，在选择欺侮或暴力的被害者上体现了集团意识。在班级这个集团中，尽管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但要得到别人的承认要有一定的限度。如果超出这个限度，就容易被看作“异己的人”，让人感到“碍眼”或“不顺眼”，容易成为欺侮和暴力行为被害的对象。所谓“异己的人”，有时是指那些在集团中在特性和性格方面比较突出的成员，总之，在加害者的眼里看来，那些看起来像是自己的同伴，但表现出不同之处的同班同学，就会被看作不是自己人，没有被自己所同化，因此容易成为欺侮和暴力的被害者。其次，加害者多数是以“集团”的形式对个人或少数人进行欺侮或暴力行为。对他人进行欺侮或暴力行为毕竟是一种不好的行为，只有以“集团”的形式出现，才能表现出所谓的“合理性”。以“集团”形式出现的欺侮或暴力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欺侮或暴力行为本身就是以“小集团”的形式来进行。第二，欺侮和校内暴力是在“集团”的承认和默许下进行的。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集团意识的表现，它充分反映了集团意识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儿童的精神世界中。其中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班级集团的对欺侮的承认和默许，是造成欺侮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欺侮不仅仅是因为加害者和被害者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起。从加害者这一方来说，不仅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也是他们所属的班级或小组的文化和价值体系的问题。也就是说，欺侮这种越轨行动，本来是要接受集团内的制裁，使其行动受到抑制，回复到原来的既定秩序。但是，由于除了加害者和被害者之外班级其他成员的态度，使得欺侮长期存在下去。这些人可以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旁敲侧击地鼓励欺侮的积极支持者，一个是看到像没看到那样的消极支持者。前者更像是参加欺侮但活动性较少的人，后者更像是怕被牵连而不得不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日本教育家和精神病学家土屋守指出：“现代欺侮的构造是三角构造，是一个人（被欺侮者）对

少数人（欺侮者）和对多数人（旁观者）的结构。少数人对某人进行固执的阴险的攻击，但这还不足以导致被欺侮者的死亡。但是少数人旁边有多数的旁观者的存在，这个‘多数’就变成了造成被欺侮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知道这是一种欺侮现象，却在旁边看着的儿童，成为现代欺侮结构的中心位置。”^[7]可见，欺侮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一种集体行为，是欺侮的加害者和旁观者共同对少数的被害者进行的欺侮行为。

三、结语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主要受到两次较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第一次是明治维新时期西欧文化的冲击，第二次是二战结束后美国文化的冲击。每当外来文化冲击之时，日本总是采取“和魂洋才”的方针，在不断吸收西方技术文明的同时，努力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当今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个东方国家比日本的西化程度更高了；然而与此同时，恐怕也没有哪个东方民族比日本更善于保存传统文化了。一方面，日本人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日本人又在十分顽固地维护着自己的民族传统。”^[8]日本人之所以努力维护其民族传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人的自卑心理。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一直处于东西方文化的边缘，强烈的文化落差，造成了日本人文化心理上的不安感。这就促使日本人在学习和赶超先进文化的同时，努力维护自己的民族传统，唯恐丧失其精神家园。二是日本人的自信和自尊心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人逐渐形成了对日本文化传统的自信和自尊心理。尽管在明治维新初期和二战结束后初期，日本人也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崇拜，对日本文化的优越性产生过动摇，但不久便改弦易辙，重振民族精神，对外来文化采取有选择地吸收的方针。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高速发展的经济给日本人带来的巨大优越感，使日本人过分自信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形成“日本文化第一”的心态。一些日本人甚至认为，“美国世纪”已经结束，21世纪是“日本世纪”。^[9]在这种心态下，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多元文化冲击，日本人更加自信地采取“和魂洋才”的方针，更加努

力地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创建文化大国的方针，修改和平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企图，推崇新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等举措都是其具体的表现。

日本人善于学习先进文化和善于维护文化传统的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和加以学习的，然而，一味地固守文化传统，阻挡传统前进的步伐和变化的趋势也是有其缺陷的。我们知道，文化传统有优有劣，同时也具有双重性——既是民族宝贵的财富，又是民族发展的包袱。“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遏制人们思想、规范人们行动的本性，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将出现某种不堪设想的和不忍设想的后果。”^[10]如果说近代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面临两次较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日本人还多多少少认识到文化传统的惰性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时，日本人对文化传统的过于自信，使他们将传统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东西，阻碍了传统前进的脚步和变化的趋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和遗憾。

“文化是重要的，它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11]发展中的日本文化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说，文化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影响甚至要超过政治、经济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影响。这是因为，文化的延续性和周遍性决定了文化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影响是“渗透性的”，是对学校道德教育的过程和领域的全面及全过程的影响。^[12]无疑，日本文化对学校道德教育的影响也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即便是文化传统也如此。但是，日

本文化传统对学校道德教育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日本人在长期固守“和”的观念和集团意识等文化传统中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部分，有必要进行反省、加以改造和发展。否则，它们将阻碍日本文化自身的进步和发展，阻碍日本学校道德教育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 顾明远. 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
- [2] 卞崇道. 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 [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130－131.
- [3] 王家骅. 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245－246.
- [4] 吴潜涛. 日本伦理思想与日本现代化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03.
- [5] 王丽荣. 中日道德教育的异同 [J]. 比较教育研究，2003，(5)：42－48.
- [6] Khan, Y. Japanese moral education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7. 208.
- [7] [日] 土屋守. 荒废的孩子们的心——对教养、教育的提议 [M]. 东京：大修馆书店，2001. 96.
- [8] 陈炎. “文明”与“文化” [J]. 新华文摘，2002，(6)：131－133.
- [9] 王一丹. 日本的民族文化观念与教育改革 [J]. 外国教育研究，1989，(3)：49－52.
- [10] 庞朴.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J]. 新华文摘，2003，(9)：134－137.
- [11]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李俊清编译. 再论文明的冲突 [J]. 新华文摘，2003，(5)：160－163.
- [12] 檀传宝. 学校道德教育原理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98.

(责任编辑：许 敏)